

瓷上“中国风”

——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牟晓林 著



瓷上“中国风”

——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牟晓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上“中国风”：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

销 / 牟晓林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039-6512-8

I . ①瓷… II . ①牟… III . ①古代陶瓷—外销—研究

—景德镇—明清时代 IV . ①F724.787②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8148号

瓷上“中国风”

——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著 者 牟晓林

责任编辑 叶茹飞

书籍设计 赵 磊

封面设计 唐宽欣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84057666 84057660（总编室）

（010）84057696 84057698（发行部）

传 真 （010）84057660（总编室）84057670（办公室）

（010）84057690（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6512-8

定 价 48.00元

序

晓林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转眼间，他毕业四年过去，如今已成为单位上敬业尽职、口碑甚佳的青年业务骨干。我为之欣慰，此刻得知晓林博士学位论文经打磨深化后即将出版，更添为师者的喜悦。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学制为三年，通常第一年进行课程学习，第二年开始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写作，真正投入研究性写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没有艰苦付出和一定基础，博士生要想如期完成学业是不可能的。晓林本科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学院，与陶瓷艺术和瓷业环境有耳濡目染的四年经历；后入首都师范大学随导师吴明娣教授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其学位论文《十八世纪中国瓷绘西洋人物图像研究》所关注的是景德镇的外销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外销瓷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相关的学术成果更多限于中外交通贸易史范畴，多元学科视角尤其艺术学视角依然不是很充分。鉴于这种情况和他此前已有的学业基础，我赞同晓林读博阶段继续在其较为熟悉的领域开展研究，以期取得更深入的学术成果。他于是选择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的研究目标，力求探究和揭示海外市场的需求及外贸文化交流之于景德镇瓷器生产和艺术的塑造性影响。虽说研究工作不是零起步，但要在明清两朝五百多年历史跨度和外销瓷广阔市场中寻绎艺术和工艺方面的表征因素，揭示文化交流过程的互动性影响，其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好在晓林心性沉静，治学勤奋，舍得下苦功夫，坐得住冷板凳，以至一番努力下来，较为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为认识景德镇瓷器艺术发展历史打开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是动态演进的过程。这当中既有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历史积累，也有空间维度上的横向域际交流。晓林对其课题的基本设想是：陶瓷艺

术作为外贸商品的价值交换过程也是关系思想观念和文化信息的城际交流过程。明清时期海外市场在接受景德镇瓷器的过程中，既有对器形所关涉的实用价值和纹饰所关涉的审美价值及文化理念的接纳，也势必反映其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而对商品的适应性提出要求，而所有这一切终归会以市场需求因素反馈到景德镇瓷器的艺术创造及产业和工艺实践中来，从而形成甚或影响瓷业全局的景德镇外销瓷的整体面貌。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思路是合理的，它有可能为景德镇瓷器研究提供一个更阔大的关系格局。晓林从考察明清景德镇瓷器的主要海外市场入手，对景德镇瓷器生产与外销的实际情况和相应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在“需求与应对”“摹仿与内化”“适应与创新”的关系格局中展开对当时海外市场需求、影响景德镇瓷业和贸易实践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景德镇制瓷工艺和外销瓷艺术特征等问题的归纳性梳理和论析，从而立体地揭示出明清景德镇瓷器在应对海外需求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适应性以至创造性变化。这项研究通过明清景德镇瓷器生产与外销情况的深入考察，为认识以陶瓷为媒介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历史提供了一份辨析详细的学术文本，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权量借鉴对外开放以至互利共赢之历史经验的生动个案。晓林课题及专著出版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可作如是观。

《瓷上“中国风”——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付梓在即，可喜可贺。希望晓林以此为新起点，不断追求学术理想，做出学术事业上的更大文章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吕品田

2018年7月21日



目 录

001	序
001	绪 论
007	第一章 明清景德镇瓷器的主要海外市场
011	第一节 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025	第二节 欧洲地区
045	第三节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059	第四节 美洲地区
070	小 结
073	第二章 明清相关政策变化与景德镇瓷业生产
076	第一节 制随时易
090	第二节 分工细化
098	小 结

101 第三章 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改进

104 第一节 瓷土成分的变化

107 第二节 成型工艺的进步

110 第三节 装饰技艺的创新

121 第四节 窑炉结构的更替

125 小 结

127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景德镇外销的瓷器

130 第一节 品类分析——各有所好、各取所需

152 第二节 器形分析——定制之器

172 第三节 纹饰分析——出新花样总逢时

202 小 结

205 结 语

215 图片来源

218 后 记



绪
论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开始集中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华文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与创新的文化，是在与众多异文化相互碰撞、影响、交流与融合的漫长历程中形成的。其中，陶瓷在艺术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中介力量不可忽视。作为明清时期艺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陶瓷所起到的载体和媒介的作用尤其重要。

瓷器自创烧之日起，就成为艺术与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尤其是历史上两次文化交流的高峰——汉唐时期，瓷器更是作为中华民族与域外艺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景德镇青白瓷虽在宋代已颇有名气，但真正使景德镇驰名中外的恰恰是中外艺术与文化交流的产物——元青花，它的出现不仅满足了阿拉伯世界对于高品质瓷器的需要，更推动了景德镇乃至中国瓷器制造和瓷绘艺术的发展。但元青花因繁复的瓷绘纹饰而限制了其生产效率和市场占有量，因而在元代瓷器出口市场上，占重要份额的仍是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单色釉瓷器。直到明清时期，御器厂和御窑厂在景德镇的设立，精益求精的官窑生产极大促进了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受此影响的景德镇民窑业也在陶瓷生产能力及效率上有了质的飞跃，因而景德镇得以占领大片海外市场，景德镇瓷器生产和外销的高峰也随之来临。

明、清两代是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外销的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及欧洲国家新航路的开辟，形成了各大洲之间联系往来的海上新航线。明代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为景德镇瓷器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及至清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更为显著，产区更加集中化和专业化，出口贸易更加繁荣。国内迅速扩张的贸易规模使商业网在遍布各行省之外，还扩展到了蒙古、中亚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国内外贸易网络的连接使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外销

更为便捷。

明清时期外销的主要商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从商业价值和实际价格来说，瓷器虽远不及丝绸和茶叶，但它以其特殊的物质属性，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大量保存和流传，并成为历史的有力见证和文化的理想载体。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心灵手巧的陶工为景德镇在宋元时期的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景德镇制瓷业整体进入黄金时期还是从明代开始的。尤其是明中期以来，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赋役制度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景德镇制瓷业带来了新的契机。换言之，真正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景德镇瓷器是从元代过渡，到明代开始成型。景德镇制瓷业之所以在明、清两代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并远销至世界各地，除了景德镇瓷器自身在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与外销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雅俗共赏的文化魅力的吸引之外，郑和下西洋等政治推动力以及对明清时期庞大的海外市场双赢的经济吸引力，共同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巨大的内外合力。

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是艺术与文化间交流的重要前提和途径，没有承载着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瓷器的贸易往来和互通有无，就缺少了艺术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渠道。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景德镇瓷器的不同需要，反映着消费者的选择权，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日常生活和审美好尚，消费者选择的差异性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在价值观和文化观上的不同。而明清逐渐扩大的世界市场，又无时无刻不作用于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同时体现出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艺术与文化交流的成果。因此，明清景德镇外销瓷上凝聚着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生活习惯、审美好尚、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视觉化和艺术化体现。对明清时期销往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可以从供需关系的角度出发，探寻景德镇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生产技术一路领先所取得的经济优势，及其成为艺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景德镇外销瓷形制的不同需求而引起的影响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与外销的内因和外因；也可以利用不

同地区的考古发掘、海上沉船出水的瓷器实物，结合相关史料及东印度公司保存的贸易资料，重建当时景德镇陶瓷艺术在大量的生产与外销中所呈现的新面貌。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所说：“我们若把瓷器视为一项文化聚焦物、一个艺术与商业汇流的交会现象、一种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制作者、购买者、欣赏者的风俗、信仰与心理等精神面向，化为具象并清晰流露的人造物品，那么其中可透露的信息就极大、极广。瓷器一身三角，处于日常生活、商业和艺术的交集，同时是实用品、商品又是藏品。瓷器与社会行为、长途贸易和上流品位的关系异常密切，还提供我们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历史，照见瓷器本身之外的其他诸多议题。”^①从这方面看，陶瓷艺术的传播过程是思想观念和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景德镇瓷器在远销世界的同时，也把陶瓷艺术和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艺术与文化承载物的景德镇瓷器，必然打上了明、清社会的时代烙印和艺术与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印痕。在明清时期业已成熟的海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及其艺术形象背后的一整套艺术语汇和文化观念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与器形相关的实用性及与纹饰相关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观念的接受与变异，从而以需求的形式完成对景德镇瓷器生产与艺术创造的反馈与影响。艺术与文化的交流作用不断提高着文化机制的适应性并最终形成文化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以瓷器为媒介的文化与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以及不同地域文化对待陶瓷艺术的认识与自我认识的差异。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固有含义，在传向异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阐释，不断地重新编制符号构成新的衍生意义，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对接收者产生持续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的行销和运输及景德镇陶瓷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研究景德镇瓷器的海外需求所促成的新的艺术样态、审美风尚、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甚至社会运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成为本文的

^① [美]罗伯特·芬雷著、郑明萱译：《青花瓷的故事》，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4页。

核心价值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推进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纵向时间维度上的明、清两代 500 余年的技艺的积累与创新，更包括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城际交流和艺术门类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艺术层面，更会引起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本书强调的是由认识、接受和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引起的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一系列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引起陶工的技艺创新、适应性生产和文化自觉，以及陶瓷艺术的形塑和裂变，最终形成明清景德镇陶瓷多样性和稳定性并存的艺术面貌。



第一章

明清景德镇瓷器
的主要海外市场

陶瓷的生产和应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陶瓷的外销和以陶瓷为载体的艺术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样源远流长。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汉代时，中国古陶瓷已传入邻近国家，“但是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①。景德镇瓷器的对外贸易应始于宋代。宋朝政府为鼓励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图 1-1）。市舶司的设立，促进了包括景德镇青白瓷在内的全国各窑口陶瓷器的外销。在东亚的日本和北非的埃及都发现了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为元代及后来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奠定了基础。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异军突起，深受海外市场——尤其是

西亚、东南亚和北非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宋代以来景德镇各类瓷器的外销，初步拓展了海外市场，可视为明清景德镇大规模海外陶瓷贸易的先声。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图 1-2），在加强与亚非各国政治和文化往来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海上“陶瓷之路”贸易航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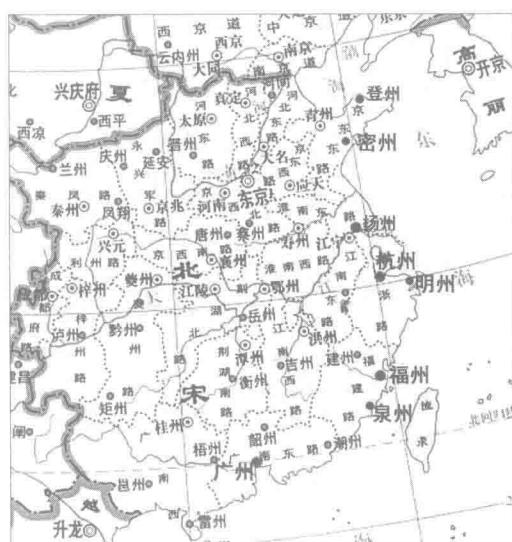


图 1-1 宋代沿海港口分布图

^①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

的重要地位。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的海上活动基本上不再超出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对外贸易量有所下降，以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和小规模的私人贸易为主。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速度随之加快，流通范围更加广阔。国内运输瓷器的水陆交通和商业网络应运而生，官窑瓷器“查明初陶厂皆有水运达京”，民窑更依赖水运，自昌江到鄱阳湖进赣江顺水至大庾岭，转陆路至北江，后顺北江而下到广州；或自昌江入鄱阳湖到九江转长江至宁波等港口城市。国内水陆交通的发展便利为景德镇瓷器外销和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合理的分工使景德镇制瓷业成为一个高效有序的有机体，在完整的生产与销售系统之中，长久保持着陶瓷产品的高品质、高产出和创新能力。在政局不稳的明代后期，国内陶瓷市场购买力衰退的情况下，拓展海外陶瓷市场成为明末景德镇制瓷业的迫切要求。新航路的开辟使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锋的欧洲国家纷纷东来，它们努力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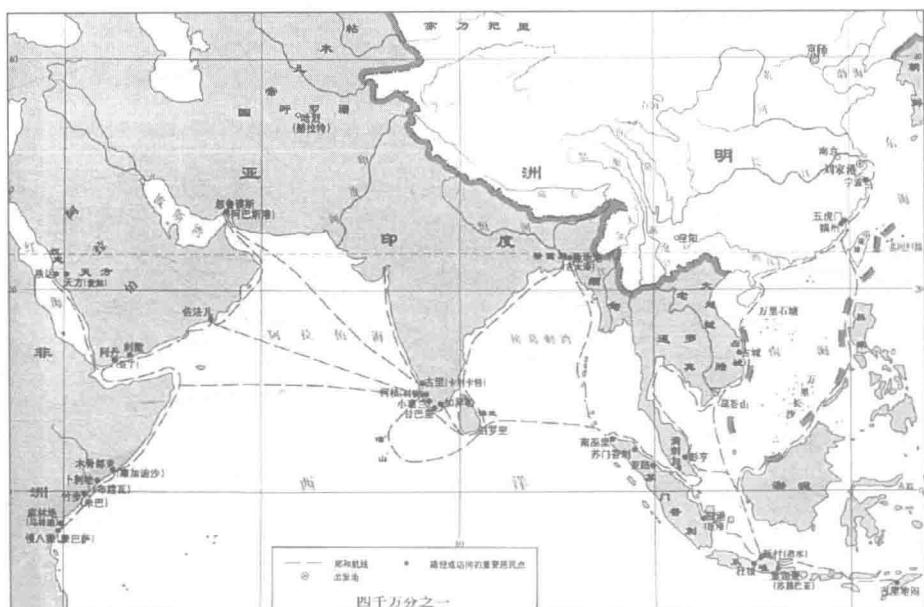


图 1-2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